

# 积极创造力之研究现状与展望\*

洪灵芝<sup>1,3</sup>, 张凤娟<sup>1,2</sup>, 黄绍旭<sup>4</sup>

(1.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系, 桂林 541004; 2. 广西认知科学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桂林 541004;  
3.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第二小学, 广州 511340; 4. 广西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南宁 530006)

**摘要:**积极创造力聚焦创造力背后的善意目的及积极结果。文章通过厘清积极创造力的概念与测量方法,发现现有积极创造力之界定可分为结果性、目的性和整合性三种,研究者主要采用改进的替代用途任务及问题解决任务测量积极创造力;现有研究侧重从个体和环境两方面探讨积极创造力的影响因素,而如何通过教育培养积极创造力亦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未来研究应基于对积极创造力内涵及结构的充分认识,探索其多元成因与认知神经机制,以揭示积极创造力的发生机制,进而推进其应用研究。

**关键词:**积极创造力;测量;影响因素;培养  
**中图分类号:**B84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5)06-0507-08

## 1 引言

创造力是技术革新乃至社会进步的核心要素,其直接决定民族创新能力与国家发展动力(贾绪计,林崇德,2014;岳晓东,龚放,1999)。评判创造力水平,学界普遍将新颖性和适用性作为其基本标准(Runco & Jaeger, 2012)。值得注意的是,自概念提出至今,创造力多被贴上“积极价值”、“天然善意”等标签,而其价值取向问题则成为学界当前争议热点。具言之,就个体而言,创造力被视为自我表达形式之一,涉及个体尊严、内在价值表达、自我实现等(Maslow, 1962; Rogers, 1954);而从社会角度看,创造力被认为是社会发展、国家繁荣稳定等的必要条件(Montuori & Donnelly, 2020)。创造力与某个体、群体或社会的“利益”存在紧密联系(Cropley et al., 2008),且研究者多默认创造力具有“积极性”。然而,进入21世纪,恐怖组织行动及违法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对社会危害影响日益增大,由此学界开始对创造力的“天然积极性”产生质疑,创造力的“阴暗面”逐渐被关注(Clark & James, 1999; Cropley, 2010; Kapoor & Kaufman, 2022),其核心研究方向之一便是在把握创造力“阴暗面”发生机制的基础上,探讨如何降低或抑制该“阴暗面”的出现及发展(程瑞等, 2021; Cropley, 2010)。新冠疫情2020年席卷地球,诸多全球性难题给人类带来挑战,人类需要一种能够应对重大挑战与增加福祉的创造力(Kaufman & Glăveanu, 2022),故此,创造力“积极面”探究亟待深入。因学界界定积极创造力之视角多样,导致其

定义尚有诸多争议,故此本文拟通过追溯积极创造力研究,基于对积极创造力概念之发展的系统梳理,厘清测量方法及影响因素与培养等,聚焦创造力的“光明面”,以期为学界探索积极创造力问题提供参考。

## 2 积极创造力的界定

根据视角及侧重点的不同,目前研究者对积极创造力的界定主要有三类:结果性、目的性和整合性界定。

### 2.1 聚焦结果的界定

根据经典定义,创造力指形成具有新颖性与适用性的想法或产品(Runco & Jaeger, 2012),据此可用创造性的结果(产品)来衡量创造力。而根据结果之不同效用,Clark和James(1999)等将创造力分为积极创造力(Positive Creativity)与消极创造力(Negative Creativity)。在组织背景下,积极创造力的表现形式包括改进生产过程或产品、提高员工士气、有吸引力的营销策略等,如“想出一种能增加公司收入的新方法”,而消极创造力则表现为伤害个体、团体及组织等行为,如“获取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Clark & James, 1999; Cropley, 2010)。聚焦结果的界定使得创造力常被贴上“产品”的标签,此有利于客观层面的衡量。然而,仅从结果层面考察创造力,无法揭示积极创造力的潜在过程,且创造者的意图或目的亦需要兼顾(Cropley et al., 2008; Runco, 2022)。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CSH049),“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人文社会科学类课题(2023QGRW008)。  
通信作者:张凤娟, E-mail: zhangfengjuan003@163.com; 黄绍旭, E-mail: huangshaouxu006@163.com。

## 2.2 聚焦目的的界定

恶意创造力 (Malevolent Creativity) 相关研究促使研究者通过聚焦目的的界定积极创造力。所谓恶意创造力是指蓄意对某对象 (自己、他人或组织) 进行伤害或由反社会动机驱动以达到某种利益目的的创造力 (Cromptley et al., 2008)。与之相反, 积极创造力 (或称“善意创造力”, Benevolent Creativity) 是受善意 (亲社会) 目的驱动、旨在为他人生活做出贡献的创造力 (Forgeard & Mecklenburg, 2013)。聚焦目的的界定更为注重创造者的主观意图, 可谓是对聚焦结果界定的进一步深化。

然而遗憾的是, 无论是从结果性或目的性界定积极创造力, 均难以合理解决如下问题: (1) 如何判断积极创造力的“利益”主体。Cromptley 等人 (2008) 提出创造力存在利益主观偏差, 对某个体或群体有益的创造力, 对其他个体或群体可能意味着损失与伤害, 即创造力的积极性与否取决于判断主体, 而究竟谁能成为真正的判断主体, 现有积极创造力概念难以回答。(2) 积极创造力的长期效益问题。具言之, 在特定时间与地点发挥积极功能的创造性产物, 可能在另一时间或地点发挥中性或消极功能 (Sternberg & Chowkase, 2021)。以社交媒体为例, 其最初是为促进人们的交流联系而被发明, 社交媒体的出现极大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但其也可能被用于恶意宣传, 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如 2016 年出现的鼓励青少年从事自残行为的“蓝鲸挑战”事件。(3) 为何不同文化对积极创造力的认定存在差异。文化是塑造创造力的重要环境因素 (Kaufman et al., 2019; Niu, 2019; Shao et al., 2019), 其影响集中体现东西方文化对创造力的不同理解, 如跨文化比较研究表明: 西方文化注重创造性过程和产品, 强调创造者如何克服困难并取得个人成功, 而东方文化侧重创新精神和创造者个人特质, 强调创造者的道德及社会贡献 (沈汪兵, 袁媛, 2015; Shao et al., 2019)。简言之, 不直面回答上述三个关键问题, 则难以揭示积极创造力之本质。

## 2.3 基于整合的界定

针对上述问题, 基于对天赋 (Giftness)、智慧 (Wisdom) 及创造力关系的探讨, Sternberg (2021) 在积极创造力的基础上提出变革型创造力 (Transformational Creativity), 即为实现集体共同利益而对世界产生积极的、有意义的、持久性影响的创造力。具言之, Sternberg (2022) 认为存在两类天赋: 交易型 (Transactional Giftness) 与变革型 (Transformational Giftness) 天赋, 前者旨在谋求自身的利益, 后者则指个体寻求以某种程度积极地改变世界, 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天赋, 即运用天赋做出积极而有意义的改

变, 利用自身所长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而智慧则决定天赋运用的方向 (Lynch & Kaufman, 2019; Sternberg, 2022), 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积极人格特质, 智慧恰为朝向共同利益、帮助自己和他人共同获得美好生活的善意动机 (陈浩彬, 汪凤炎, 2013)。高智慧个体不仅能最大化私利, 亦能平衡个人与他人利益及其他各方的长远利益; 反之, 低智慧个体常在上述方面失衡, 甚至可能给他人或社会带来危害 (Sternberg, 2004; Sternberg & Karami, 2021)。我国学者提出的“德才兼备”和“仁且智”等涉及智慧的中国见解 (陈浩彬, 汪凤炎, 2013; 刘昌, 2017) 可为智慧在积极创造性中的作用提供洞见与指导。

综上, 变革型创造力是积极创造力的整合性界定, 其聚焦于个体在发挥创造力时需考虑是否致力于共同利益, 同时要求个体平衡受影响的各方利益, 考虑短期和长期的可能后果, 体现出积极的道德价值观。由此可见, 从侧重利己到关注利公, 学界深化创造力认识的同时, 更加重视其公共道德层面的作用。

## 3 积极创造力的测量方法

如何有效测量积极创造力是积极创造力研究的基础工作和重要环节, 亦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因研究者们对其定义尚未达成共识, 加之现有研究的核心问题及侧重等各异, 导致当前积极创造力相关测验缺乏系统性及针对性。值得注意的是, 现有研究对积极创造力的考察多将其作为恶意或消极创造力之比较对象, 且为达到对比条件, 积极创造力的测验编制则通常依托于恶意创造力测验, 此做法难以从根本上反映积极创造力的特点。鉴于此, 极有必要梳理、分析积极创造力现有测量方法, 以便后续优化、开发测量工具。

改进的传统替代用途任务 (Alternative Uses Task, AUT) 常被用于测量积极创造力。Kapoor 和 Khan (2017) 认为通过评定日常用品的效价 (积极或消极) 及操纵可诱发积极/消极创造目标的指导语, 可测量个体的积极/消极创造性水平, 测量指标包括效价与新颖性。具体程序为: (1) 在预实验中, 要求参与者对提供的日常用品之效价进行 5 点评分 (1 = 十分消极, 5 = 十分积极), 进而根据评分选择具有积极效价的日常用品 (如, 报纸、纽扣等) 和消极效价的日常用品 (如, 刀子、绳索等) 用于正式实验; (2) 正式实验中在诱发积极目标的指导语条件下, 要求被试想出积极效价日常用品的新颖性用途。由此, 通过被试报告的积极效价物品新颖性用途水平测定积极创造力。另一种 AUT 的变体则是基于现实场景的发散思维任务 (Real-world Divergent Thinking Task), 该任务将 AUT 日常用品替换为现

实场景,被试需要想出尽可能多的新颖方法处理现实场景问题,如想出新颖方法帮助一位急着参加会议但不慎断了高跟鞋鞋跟的女士(Qiao et al., 2022),进而基于此,测量积极创造力之新颖性、流畅性等水平。上述两种任务均源于经典的发散思维测验,无论实验范式还是测量方法皆已有较为成熟的程序,因此广为研究者使用。

此外,问题解决任务也被用于测量积极创造力。Clark 和 James(1999)最早在问题解决任务中研究积极创造力,该任务要求被试想出尽可能多的创造性方法以解决预设问题。Harris 等人(2013)对该任务之计分和统计方法进行改进,进而分离出积极、中性及消极三类创造性问题,并设计对应指导语,如在积极创造力问题中,要求被试想出尽可能多的创造性方法,以含蓄地帮助同学提升学习成绩。Gutworth 等人(2018)则基于现实场景设计出两可问题,如设计一场提升学校声誉(善意)或打击竞争学校(恶意)的活动,随后对被试的回答进行新颖性、有用性和恶意性三维评分。问题解决任务多被用于同时考察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和创造力间的关系(李阳,白新文,2015),其总体程序与基于现实场景的发散思维测验较为接近,但是问题解决任务要求评分者具备该问题解决场景的丰富经验等,对评分者的要求更高。

就本质而言,上述任务均属于开放式测验,其在评价上存在主观性,如何做到科学且标准化是积极创造力的此类测量必须直面的问题;作为发散思维任务不可避免受到个体间经验性偏差的影响(Runco & Acar, 2010),故未来研究有待兼顾个体知识经验等方面的差异。再者,已有研究均侧重基于结果对积极创造力水平进行评价,此难以反映积极创造力过程性信息,亦难以了解个体创造性评价的标准。故此,未来研究可考虑加入创造者意图的表达及加强过程性的评价,以促进对积极创造力发生过程的理解。此外,已有研究所采用的积极创造力问题场景多局限于日常生活,随着积极创造力定义的不断扩展,亦应考虑适当增添社会领域乃至全球范围内更需要创造性解决的公共问题,如空气污染、公共卫生等。

#### 4 积极创造力的影响因素与培养

积极创造力概念自1999年提出至今,已有研究关注重心主要集中在积极创造力之影响因素及其培养问题。针对积极创造力影响因素问题,目前研究者主要从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角度开展研究。

##### 4.1 影响积极创造力的个体因素

驱动个体产生积极创造性行为的个体因素主要包括创造者的动机、人格、情绪智力和观点采择四个

方面。具言之:

(1)动机是影响创造力水平的重要个体心理因素,而亲社会动机是影响积极创造力的关键因素。亲社会动机是一种关注他人且旨在帮助他人的动机(De Dreu et al., 2011),其与积极创造力造福他人或社会的意图相一致。研究表明利他主义的个体往往对他人的需求更为敏感,能主动将他人需要置于自身利益之前并更热切地帮助他人(Pfattheicher et al., 2022)。Lin 等人(2023)发现利他主义共同预测了组织中员工创造性表现以及亲社会行为表现。Forgeard 和 Mecklenburg(2013)强调创造者产出创造性成果时,需要思考创造性成果的预期受益者,而亲社会动机既有助于提升个体创造力表现,也有助于创造者对预期受益者可能造成何种影响的思考。李阳和白新文(2015)发现“善心”(即亲社会动机)能够提升个体积极创造力表现,即当启动亲社会动机时,被试能想出更多的创造性点子帮助目标对象。张克等人(2018)亦发现亲社会动机组的被试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创造力。从最终目标上看,个体产生的创造性产品必须满足适切性的标准,即要满足社会大多人的殷切需求,而利他主义下的个体旨在增加其他个体的福利,因此,利他与积极创造力享有共同的目标,二者关系密不可分。简言之,积极创造力通常要求创造者仔细考虑创造性成果对“受益对象”可能带来的有利或不利影响,指向受益对象的亲社会动机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此类思考。

(2)研究者已揭示人格特质对积极创造力有直接影响,集中在经验开放性。在众多人格特征中,经验开放性是大五人格中与创造力最为密切的人格因素,高经验开放性的个体更愿意尝试新事物,且对新知识也更具包容性(Batey & Furnham, 2006)。根据盲目变异选择性保留模型(Blind Variation Selective Retention Combinatorial Model, BVSR),创造力的产生是知识的组合过程,个体盲目产生各类想法,随后选择性地保留有助于问题解决的个别想法(Simonton, 2010)。Batey 等人(2022)研究证实经验开放性正向预测善意创造力,其认为人格以“输入—过程—产出”的形式影响 BVSR 机制,具体而言,高开放性个体善于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且更容易接受与整合新的思维方式,这为其提供了更多的灵感和资源发展新颖的想法,进而影响其知识的获取(输入)、对知识的组合(过程)以及想法的产出(输出)。此外,近年来研究者提出与黑暗三联征(即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与精神病态,预测个体产生恶意想法的核心人格)相对应的光明三联征(Light Triad,即人性信仰、人道主义以及康德主义)(Kaufman et al., 2019),其究竟通过何种路径或机制影响积极创

造力,目前尚不得而知,未来研究者极有必要考察光明三联征对积极创造力的影响,以深化积极创造力的人格影响研究。

(3)情绪智力是指个体处理自身和他人情绪的能力,也是个体理解、使用和管理情绪的能力(Mayer et al., 2008)。以往研究表明,高情绪智力个体倾向于采用积极与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低情绪智力个体则倾向采用消极和回避的方式解决问题(Gómez - Baya & Mendoza, 2018)。情绪智力与创造性表现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Geher et al., 2017; Xu et al., 2019)。为了考察情绪智力对不同效价创造力的影响,Harris 等人(2013)分别在问题解决任务和发散思维任务中检验二者的关系,结果发现:在相同的创造性任务中,高情绪智力个体能想出更多合作性和积极有益的方法以解决问题,而低情绪智力个体想出的方法更具消极性和伤害性。可见,情绪智力亦是影响积极创造力的重要个体因素。

(4)观点采择作为个体从他人角度认识世界的的能力(Galinsky & Ku, 2004),是智慧的核心成分(Sternberg, 2013)。观点采择能力发展较好的个体善于从他人角度出发,对他人的需求更敏感。鉴于积极创造力常需要发挥创造力以使他人获益,而创造性行为源于创造性问题(Glăveanu, 2015),这便需要个体敏锐察觉他人所需,据此找到有价值的积极创造力问题。实证研究表明,观点采择可以促进个体与团队的创造力表现(Doron, 2017; Wang et al., 2017),如其有助于团队对信息的细化,促进团队生成更具多样性的创造性想法;而在创造性评估方面,观点采择也可以帮助创造者选出“適切”与“积极效益”的最佳想法(Grant & Berry, 2011; Silvia, 2008)。

#### 4.2 影响积极创造力的环境因素

创造力无论积极还是消极,均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Glăveanu, 2015)。就积极创造力而言,现有研究显示,其主要受到社会情境、文化差异的影响。

(1)社会情境是积极创造力的突出影响因素,其中公平的情境、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积极的组织氛围等促进个体积极创造力的发挥(Clark & James, 1999; Hannam & Narayan, 2015)。Clark 和 James (1999)率先关注情境因素,聚焦公平情境对个体积极创造力的影响。在该研究中,被试随机分至公平组和不公平组,公平组被告知会获得6张中奖彩票,而不公平组则被告知无法获得任何一张彩票。随后,两组分别完成一项积极创造力(公益募捐)和消极创造力任务(打败竞争对手)。结果发现:感知公平促进了个体在积极创造力任务中的表现,而感知不公平则促进个体在消极创造力中的表现。

(2)在社会文化层面,东方文化对积极创造力

具有重要滋养作用。根据积极创造力的界定,个体在创造性活动中要能体现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对他人的需求保持敏感,展现出亲社会行为倾向,并能妥善平衡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创造力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受不同文化所重视要点、追求意义等影响(张亚坤等, 2018),表现出对创造力评价的不同标准。如在个体主义的西方文化中,强调创造者个人的特立独行、创新成果的独创性及在当下的作用;而在集体主义的东方文化中,则强调创造者在社会中的贡献、创新成果的恰当性以及其在过去、当下和未来的作用(Niu, 2019; Niu & Kaufman, 2013)。此外,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把仁爱作为完美人性的标准之一(吴国盛, 2016),同时亦能自觉将个人进行创造的目标融入社会与国家的发展目标(Kim & Hua, 2019),即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对创造力的理解与积极创造力的建构具有高度重合性。因此,东方文化背景更有利于促进积极创造力的产生与培养。

#### 4.3 积极创造力的培养

如何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学生积极创造力亦是研究者们聚焦的重要议题之一。Sternberg 和 Chowkase (2021)主张从四个核心方面培养学生的积极创造力: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研究者们则从不同角度提出对上述四个方面的教育建议。

(1)引导学生建构积极创造力概念。建构积极创造力概念有助于学生建立衡量积极创造力的标准。教育者可通过诸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情景案例研究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建构积极创造力概念(Sternberg & Chowkase, 2021)。

(2)培养积极创造力能力与技巧。教育者需重点培养三类技能:一般创造力技能(发散思维能力、想象能力等)(Desmet & Roberts, 2022; Sternberg & Chowkase, 2021)、决策技能(收集相关信息、确定备选方案、权衡多方面信息、备选方案选择、行动和审查决策等)及批判性思维技能(深入分析、逻辑解释、推理构建、评估、判断和反思等)(Beghetto & Anderson, 2022; Sternberg & Chowkase, 2021)。具体而言,在一般创造力技能训练上,可采取发散思维任务。鉴于积极创造力需要符合新颖性的标准,而发散思维任务要求学生生成大量想法,有助于促进学生想法新颖性的表现(Runco, 2010)。而在批判性思维技能培养上,可从培养学生道德推理能力入手。道德推理任务通常涉及道德两难情景,要求学生谈论困境的细节并想出最佳做法,结合小组讨论运用于积极创造力培养中(Runco, 2022)。此外, Kaufman 等人(2022)提出亦需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元认知,提高学生对自身创造性过程的监控与调节,最大

程度地发挥自身创造性潜能。

(3)提升创造性信心与亲社会动机。创造性信心(包括创造性自我效能与创造性自我概念)是促使个体将创造性潜能转化为创造性行为的重要中介因素,其能够增强个体参与创造性活动的意愿,并帮助个体在面对挑战时坚持不懈地克服困难,从而最终实现创造性行为(Karwowski & Beghetto, 2019; Sternberg & Chowkase, 2021)。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亲社会的态度能够促进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Beghetto & Anderson, 2022),作为创造性活动的自我调节因素,亦能够帮助创造者在面对困境时保持韧性,直至创造性问题的解决(Ivcevic et al., 2022)。研究表明:自认为是亲社会问题解决者的学生更可能做出亲社会行为(Ivcevic et al., 2022),表现出积极创造力。

(4)培养积极创造力的自我调节行为。创造性过程通常是一个动态、长期的过程(Walia, 2019),最初的创意转化为创造性行为及最终的产品,并使之触及受众和预期受益者,此过程需要自我调节的参与(Zielińska et al., 2022)。在学校情境中教育者可指导学生如何通过学习如何通过积极与持续的评估,特定情况与创造力相关的潜在收益与风险,以监控与调节创造性行为(Ivcevic et al., 2022)。此外,在日常生活中可加强学生的自我调节训练,如定期的元认知练习,评估自己想法后果的练习,以及自我调节练习等(Sternberg & Chowkase, 2021)。

## 5 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对积极创造力的探索已20年有余,基本的研究范式已形成,相关影响因素亦有大量探讨。然而,仍有诸多关键问题尚待深入探索与解答。

### 5.1 积极创造力的概念界定尚待完善

自积极创造力提出至今,其概念界定存在争议,尚待完善,后续有待兼顾文化差异。可在以下两个方面增进:(1)积极创造力被定义为需要对自己、他人或社会产生明显的好处,然而个体有可能在谋求自身利益时损害他人的利益,因此未来对积极创造力的定义是否应该包含“不伤害”的要求有待考察;(2)创造力的两个属性“新颖性”与“有用性”本身存在文化上差异(Niu, 2019),积极创造力则更需要从本土化的角度出发,以适应不同文化的道德规范要求。

### 5.2 具有针对性、適切性的积极创造力研究工具亟待开发

已有研究工具局限于对中性创造力的考察,而现有特定测量积极创造力的研究工具有限且受制于概念不统一,难以直接进行使用。鉴于此,后续突破方向有二:(1)探索针对积极创造力之独特机制的

研究范式。已有积极创造力相关研究多遵循创造力效价的范式,即默认在测量过程中创造力只能是消极/积极其中之一,而随着积极创造力的概念拓展及其独特脑机制的揭示(Qiao et al., 2022),亟待深入考察积极创造力独特机制,如在基于现实场景的发散思维任务中设计能反映积极创造力的“独特情境”,并根据研究对象的创造力水平(如使个体受益的创造力、使他人受益的日常创造力、影响整个领域或行业的创造力等)设计相应的情境任务。(2)研制针对积极创造力具有適切性的量表。相较于消极与恶意创造力的量表,当前缺乏完整考察积极创造力的量表。作为新近提出的对积极创造力的深化认识,变革型创造力关注利公及时间维度利弊,其测量工具亦有待研发。未来研究需在深入揭示积极创造力内涵与特点的基础上,采用科学的开发流程,研制出能反映内涵特点且本土化的积极创造力测量工具。

### 5.3 积极创造力的影响因素有待深究

现存研究已展开对积极创造力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初步考察,但目前不同层次或水平的积极创造力之独特影响及作用机制等尚未涉及,有待进一步探究。具言之,(1)积极创造力具有多层次多水平,已有研究集中于对日常积极创造力的考察,更高水平的专业创造力或者更低水平的微创造力(Mini-c)是否存在独特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后续研究应给予重视;(2)情绪是影响创造力的重要个体内部因素(Vosburg & Kaufmann, 2015; 卢家楣等, 2002),但目前缺乏涉及情绪与积极创造力间关系的直接研究。基于积极创造力之概念及学界已有认识,可推测积极道德情绪可能是积极创造力的关键影响因素,如感恩作为个体得到他人恩惠后体验到的一种积极情绪(McCullough et al., 2002),处于感恩情绪下的个体更能激活亲社会动机(黄玺等, 2018),从而有助于产生符合普遍社会价值标准的、利他的积极创造性想法或行为。此外,共情是感知他人的情感和感受并以适当的情绪进行回应的能力(Rueda et al., 2015),其被研究者认为是亲社会行为与创新行为的共同重要驱动力,亦被认为是积极创造力的重要影响因素(Kaufman et al., 2019),然而共情与积极创造力的关系尚待实证研究直接检验。创新是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未来研究须综合考虑内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对积极创造力的影响,以深入探明积极创造力的发生机制。

### 5.4 基于脑区或脑网络的积极创造力认知神经机制亟待推进

基于神经机制的研究表明,积极创造力不仅涉及一般的创造认知加工过程,亦涉及与助人、利他相

关的独特脑机制(如涉及道德判断及亲社会行为等)。已有研究表明右侧颞顶联合区不仅是个体在助人意图加工中起核心作用的脑区(甘甜等, 2018),亦是促进创造力新颖性表现的重要脑区(Lu et al., 2019)。Qiao等人(2022)发现,与完成善意创造力任务相比,被试在恶意创造力任务中表现出右中枕叶区的神经激活较弱,右额极皮层和右中枕叶区之间的神经耦合较低,表明右中枕叶区活动、右额极皮层和右中枕叶区之间的神经耦合可用于区分恶意和善意的创造性思维。故此,未来研究有必要重点考察右侧颞顶联合区、右中枕叶区、右额极皮层和右中枕叶区之间的神经耦合在积极创造力中发挥的作用,深化善意观念形成的神经机制研究。此外,积极创造力概念及研究须体现智慧观,即平衡多方利益等以致力于公共利益,沈汪兵等人(2015)指出前额叶、前扣带回、丘脑和顶下小叶可能是智慧与创造力存在内在联系的神经基础。故此,未来研究可从上述脑区或其构成的脑网络入手,揭示积极创造力的深层脑机制及其特点。

### 5.5 积极创造力之培养模式及其应用研究亟待深耕

从理论层面,研究者们迄今已初步搭建培养积极创造力的框架(Sternberg & Chowkase, 2021; Ivcevic et al., 2022; Beghetto & Anderson, 2022),遗憾的是,针对积极创造力之干预的实证研究仍为空白,后续亟待妥善处理如下问题:(1)不同年龄群体的适用性问题。如李占星和朱莉琪(2015)指出,儿童道德情绪判断的发展趋势具有差异,其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受到社会认知因素、人格等的影响,故此在设计积极创造力的干预方案时,需要慎重考虑干预对象的身心发展规律,开发符合其认知特点的对性方案;(2)不同领域的適切性问题。如在教育领域,对学生积极创造力的培养应侧重训练一般创造性技能与创造性态度等,但在管理领域,对员工积极创造力的干预则更需要与管理工具(如,领导反馈等)、人际情境等环境因素紧密结合。简言之,后续亟待学界不断探索合理可行的积极创造力培养措施,以便进一步应用到学校创造力培养、员工创新行为等领域中,发挥其应用价值。

### 参考文献

陈浩彬,汪凤炎.(2013).智慧:结构,类型,测量及与相关变量的关系.《心理科学进展》,21(1),108-117.  
程瑞,卢克龙,郝宁.(2021).愤怒情绪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及调节策略.《心理学报》,53(8),847-860.  
甘甜,石睿,刘超,罗跃嘉.(2018).经颅直流电刺激右侧颞顶联合区对助人意图加工的影响.《心理学报》,50(1),36-

46.  
贡喆,刘昌.(2016).恶意创造力:概念、测量方法、影响因素以及研究展望.《心理科学》,39(1),63-68.  
黄玺,梁宏宇,李放,陈世民,王巍欣,林妙莲,郑雪.(2018).道德提升感:一种提升道德情操的积极道德情绪.《心理科学进展》,26(7),1253-1263.  
贾绪计,林崇德.(2014).创造力研究:心理学领域的四种取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61-67.  
李阳,白新文.(2015).善心点亮创造力:内部动机和亲社会动机对创造力的影响.《心理科学进展》,23(2),175-181.  
李占星,朱莉琪.(2015).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发展与影响因素.《心理科学进展》,23(6),990-999.  
刘昌.(2017).创造性的社会发生:兼论“仁且智”何以可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5),88-94.  
卢家楣,刘伟,贺雯,卢盛华.(2002).情绪状态对学生创造性的影响.《心理学报》,34(4),381-386.  
沈汪兵,袁媛.(2015).创造性思维的社会文化基础.《心理科学进展》,23(7),1169-1180.  
吴国盛.(2016).什么是科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岳晓东,龚放.(1999).创新思维的形成与创新人才的培养.《教育研究》,(10),9-16.  
张克,杜秀敏,董晓飞.(2018).社会动机与“自我-他人”对创造性表现的影响.《心理与行为研究》,16(3),414-420.  
张亚坤,陈龙安,张兴利,施建农.(2018).融合视角下的西方创造力系统观.《心理科学进展》,26(5),810-830.  
Batey, M., & Furnham, A. (2006). Creativity,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ity: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cattered literature. *Genetic, Social,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32(4), 355-429.  
Batey, M., Hughes, D. J., Mosley, A., Owens, C. E., & Furnham, A. (2022). Psychopathy and openness - to - experience as predictors of malevolent and benevolent creativ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6, 111715.  
Beghetto, R. A., & Anderson, R. C. (2022). Positive creativity is principled creativity. *Education Sciences*, 12(3), 184.  
Clark, K., & James, K. J. C. R. J. (1999). Justice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creativity.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12(4), 311-320.  
Cropley, A. J. (2010). The dark side of Creativity: What is it? In D. H. Cropley, A. J. Cropley, J. C. Kaufman, & M. A. Runco (Eds.), *The dark side of Creativity* (pp. 1-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opley, D. H., Kaufman, J. C., & Cropley, A. J. (2008). Malevolent creativity: A functional model of creativity in terrorism and crime.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0(2), 105-115.  
De Dreu, C. K. W., Nijstad, B. A., Bechtoldt, M. N., & Baas, M. (2011). Group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A motiva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erspective.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5(1), 81-89.  
Desmet, O. A., & Roberts, A. M. (2022). Teaching for positive

- and transformational creativity through service learning. *Education Sciences*, 12(4), 234.
- Doron, E. (2017). Fostering creativity in school aged children through perspective taking and visual media based short term intervention program.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23, 150 – 160.
- Forgeard, M., & Mecklenburg, A. C. (2013). The two dimensions of motivation and a reciprocal model of the creative proces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7(3), 255 – 266.
- Galinsky, A. D., & Ku, G. (2004). The effects of perspective – taking on prejudi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 – evaluation. *Personality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5), 594 – 604.
- Geher, G., Betancourt, K., & Jewell, O. (2017). The link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 *I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37(1), 5 – 22.
- Glăveanu, V. P. (2015). Creativity as a sociocultural act.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49(3), 165 – 180.
- Gómez – Baya, D., & Mendoza, R. (2018).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s a predictor of adaptive responses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during adolescenc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2525.
- Grant, A. M., & Berry, J. W. (2011). The necessity of others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Intrinsic and prosocial motivations, perspective taking, and creativ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4(1), 73 – 96.
- Gutworth, M. B., Cushenbery, L., & Hunter, S. T. (2018). Creativity for deliberate harm: Malevolent creativity and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52(4), 305 – 322.
- Hannam, K., & Narayan, A. (2015). Intrinsic motivatio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creativity.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7(2), 214 – 224.
- Harris, D. J., Reiter – Palmon, R., & Kaufman, J. C. (2013). The effec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task type on malevolent creativity.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7(3), 237 – 244.
- Ivcevic, Z., Hoffmann, J. D., & McGarry, J. A. (2022). Scaffolding positive creativity i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Education Sciences*, 12(4), 239.
- Kapoor, H., & Kaufman, J. C. (2022). Unbou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reativity, moral foundations, and dark personality.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56(2), 182 – 193.
- Kaufman, J. C., & Glăveanu, V. (2022). Positive creativity in a negative world. *Education Sciences*, 12(3), 193.
- Kapoor, H., & Khan, A. (2017). Deceptively yours: Valence – based creativity and deception.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23, 199 – 206.
- Karwowski, M., & Beghetto, R. A. (2019). Creative behavior as agentic action.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13(4), 402 – 415.
- Kaufman, J. C., Glăveanu, V. P., & Sternberg, R. J. (2019). What is and what can be: The scope and possibilities of creativity and creativity research. In J. C. Kaufman & R. J. Sternberg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reativity* (pp. 732 – 74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ufman, S. B., Yaden, D. B., Hyde, E., & Tsukayama, E. (2019). The light vs. dark triad of personality: Contrasting two very different profiles of human natur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467.
- Kim, K. H., & Hua, Y. (2019). Creativity and confucianism (Asian culture). In E. G. Carayannis (Ed.), *Encyclopedia of creativity, inven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p. 1 – 6). Springer.
- Lin, S. – Y. S., Park, G., Zhou, Q., & Hirst, G. (2023). Two birds, one stone: How altruism can facilitate both individual creativ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two different team contexts.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27(1), 65 – 79.
- Lu, K., Xue, H., Nozawa, T., & Hao, N. (2019). Cooperation makes a group be more creative. *Cerebral Cortex*, 29(8), 3457 – 3470.
- Lynch, S. F., & Kaufman, J. C. (2019). Creativity, intelligence, and wisdom: Could versus should. In R. J. Sternberg & J. Glück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wisdom* (pp. 455 – 46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slow, A. H. (1962). Creativity in self – actualizing people. In A. Maslow (Ed.),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pp. 127 – 137). D Van Nostrand.
- Mayer, J. D., Salovey, P., & Caruso, D. R. (2008).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w ability or eclectic trai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3(6), 503 – 517.
- McCullough, M. E., Emmons, R. A., & Tsang, J. A. (2002). The grateful disposition: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topograp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2(1), 112 – 117.
- Montuori, A., & Donnelly, G. (2020). Creativity and the future. In M. Runco & S. Pritzker (Eds.), *Encyclopedia of creativity* (3 ed., Vol. 1, pp. 250 – 257).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 Niu, W. (2019). Eastern – western views of creativity. In J. C. Kaufman & R. J. Sternberg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reativity* (2 ed., pp. 448 – 46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iu, W., & Kaufman, J. C. (2013). Creativity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A synthetic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47(1), 77 – 87.
- Pfattheicher, S., Nielsen, Y. A., & Thielmann, I. (2022). Prosocial behavior and altruism: A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44, 124 – 129.
- Qiao, X., Lu, K., Teng, J., Gao, Z., & Hao, N. (2022). Middle occipital area differentially associates with malevolent versus benevolent creativity: An fNIRS investigation. *Social Neuroscience*, 17(2), 127 – 142.
- Rogers, C. R. (1954). Toward a theory of creativity. *ETC: A Review of General Semantics*, 11(4), 249 – 260.

- Rueda, P., Fernández – Berrocal, P., & Baron – Cohen, S. (2015). Dissociation between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in youth with Asperger Syndrom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2(1), 85 – 98.
- Runco, M. A. (2010). Divergent thinking, creativity, and ideation. In J. C. Kaufman & R. J. Sternberg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reativity* (pp. 413 – 44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nco, M. A. (2022). Positive creativity and the intentions, discretion, problem finding, and divergent thinking that support it can be encouraged in the classroom. *Education Sciences*, 12(5), 340.
- Runco, M. A., & Acar, S. (2010). Do tests of divergent thinking have an experiential bias?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the Arts*, 4(3), 144 – 148.
- Runco, M. A., & Jaeger, G. J. (2012). The standard definition of creativity.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4(1), 92 – 96.
- Shao, Y., Zhang, C., Zhou, J., Gu, T., & Yuan, Y. (2019). How does culture shape creativity? A mini – review.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1219.
- Silvia, P. J. (2008). Discernment and creativity: How well can people identify their most creative ideas?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2(3), 139 – 146.
- Simonton, D. K. (2010). Creative thought as blind – variation and selective – retention; Combinatorial models of exceptional creativity. *Physics of Life Reviews*, 7(2), 156 – 179.
- Sternberg, R. J. (2004). What is wisdom and how can we develop i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ocial Science*, 591(1), 164 – 174.
- Sternberg, R. J. (2013). Wisdom, intelligence, creativity, synthesised: A model of giftedness. In T. Balchin, B. Hymer, & D. J. Matthews (Eds.),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companion to gifted education* (pp. 279 – 288). Routledge.
- Sternberg, R. J. (2021). Transformational creativity: The link between creativity, wisdom, and the solution of global problems. *Philosophies*, 6(3), 75.
- Sternberg, R. J. (2022). Transformational giftedness: Who's got it and who does not. In R. J. Sternberg, D. Ambrose, & S. Karami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transformational giftedness for education* (pp. 355 – 371).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Sternberg, R. J., & Chowkase, A. (2021). When we teach for positive creativity, What exactly do we teach for? *Education Sciences*, 11(5), 237.
- Sternberg, R. J., & Karami, S. (2021). What is wisdom? A unified 6P framework.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5(2), 134 – 151.
- Vosburg, S., & Kaufmann, G. (2015). Mood and creativity research: The view from a conceptual organizing perspective. In S. W. Russ (Ed.), *Affect, creative experience,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pp. 19 – 39). Routledge.
- Walia, C. (2019). A dynamic definition of creativity.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31(3), 237 – 247.
- Wang, J., Zhang, Z., & Jia, M. (2017). Understanding how leader humility enhances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roles of perspective taking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53(1), 5 – 31.
- Xu, X., Liu, W., & Pang, W. (2019). Are emotionally intelligent people more creative? A meta – analysis of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 creativity link. *Sustainability*, 11(21), 6123.
- Zielińska, A., Lebuda, I., Ivcevic, Z., & Karwowski, M. (2022). How adolescents develop and implement their ideas? On self – regulation of creative action.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43, 100998.

## The Research of Positive Creativity: Review and Prospect

Hong Lingzhi<sup>1,3</sup>, Zhang Fengjuan<sup>1,2</sup>, Huang Shaoxu<sup>4</sup>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2.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 Guilin 541004; 3. The Second Primary School of Xintang Town, Zengcheng District, Guangzhou 511340; 4.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6)

**Abstract:** Positive creativity focuses on the benevolent purposes and positive outcomes of creativity. By clarifying the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ree categories of definitions of positive creativity: outcome – oriented, purpose – oriented, and integrative definitions. Researchers mainly adopt improved alternative use tests (AUT) and problem – solving tasks to measure positive creativity. Existing researches emphasized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sitive creativity from both individual and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 How to cultivate positive creativity through educa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research issu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ased on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and structure of positive creativity, explore its diverse causes and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s to uncover its underlying processes, thereby advancing applied research in the field.

**Key words:** positive creativity; measuring; influence factors; cultivation